

小
乘
佛
學

〔俄〕舍爾巴茨基 著
宋立道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小
乘
佛
學

〔俄〕舍爾巴茨基 著

宋立道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小乘佛學 / (俄羅斯) 舍爾巴茨基
(Stcherbatsky, F. T.) 著 ; 宋立道譯. — 貴陽 : 貴州
大學出版社, 2013. 8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04-7

I. ①小… II. ①舍… ②宋… III. ①小乘—佛學
IV. ①B9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199487 號

小乘佛學

著 者: [俄] 舍爾巴茨基

譯 者: 宋立道

責任編輯: 信 實

出版發行: 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 貴陽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 7.5

字 數: 148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1126-604-7

定 價: 60.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社聯係調換
電話: 0851-5981027

本書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為 2013 年貴州省新聞出版局重點圖書，
并獲貴州省出版發展專項資金資助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爲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爲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爲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布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爲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公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爲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公元之初，佛教并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羣，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爲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公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蘊。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啓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想要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然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法一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並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原 書 序

這篇短論最初是為皇家亞洲學會的刊物撰寫的，但因其分量較大，理事會決定做專著出版，為此我謹致最誠摯的謝意。我還必須感謝 C.A.F. 李斯·戴維斯夫人，她隨時都在以巴利文獻方面的淵博知識幫助我。承蒙 H. 雅各比教授為我費心審讀了校樣，他的諸多寶貴建議，使我獲益甚深。麥克高文博士又在好幾處查對了漢文資料。但我尤其要深切感謝的是 F.W. 托馬斯博士，他花了大量寶貴時間來校訂本書直至付印。

在讀音轉寫時，我通常並不區分各類輔音之前出現的喉音或鼻音。

Th. 舍爾巴茨基 1923 年 7 月

譯者序言

此書原名《佛教的中心概念和法的意義》，臨發排付印之前改爲《小乘佛學》。相應地，其姊妹篇《佛教的涅槃概念》也易名爲《大乘佛學》。

《小乘佛學》與《大乘佛學》是俄國著名佛教學者舍爾巴茨基(Th.Stcherbatsky, 1866—1942年)的代表作品。最初即以英文寫成。出版七十餘年來一直被西方的佛教學研究者、東方學學者視爲不朽名著，代表了以西方比較語言學、比較哲學方法研究東方佛教的成果，舍氏本人被認爲是獨闢蹊徑的開拓性哲學史家。由於其特殊風格，舍氏同他的門下弟子被稱爲彼得堡學派。在20世紀20—30年代的西方佛學研究界可謂獨領風騷。

舍爾巴茨基出身於帝俄貴族家庭，從小即受良好的西歐標準的教育。少年時代，他便掌握了英語、德語、法語。1884年，他中學畢業考入彼得堡大學，就學於歷史文學系。起初其興趣完全在語言學方面。他在米納耶夫(I.P.Minayeff, 1840—1890年)教授的指導下從事語言學的尤其是梵文的學習。後者是俄羅斯著名印度學者，通曉梵語、巴利語、漢語、滿語等，其學術成果直到今天仍

然令人欽佩^[1]。米納耶夫赴緬甸考察後，又從米氏高足奧登堡學習梵文；並聽德國學者布勞恩關於古代哥特語、盎格魯·薩克森語、高地德語講座；這一時期他還學習了教會斯拉夫語。此前，舍氏也已經掌握了希臘文和拉丁文。1889年，舍爾巴茨基以優異成績畢業，在彼得堡大學任實習教員。旋即赴維也納，隨布勒爾（Bühler，1837—1898年）^[2]學習印度詩學。這一時期，舍氏在布勒爾指導下研究拜尼尼語法、印度的《法論》及古代碑銘解讀。1893年回到彼得堡後，有6年間他似乎放棄了對印度學的專注研究。1899年，舍氏赴羅馬參加東方學大會。會後，他即前往波恩師從著名學者雅各比（H.G.Jacobi，1890—1937年）^[3]。這次，他的研究題目轉到了梵文哲學文獻上。舍爾巴茨基的學術淵源可以認為有兩個方面：從布勒爾教授那裏，他繼承了對印度歷史和文學的深刻瞭解，對拜尼尼語法的研究培養了他細密的甚而可說繁瑣的分析方法；從雅各比教授那裏，舍氏吸取了東西方比較哲學研究的方法，培養了對哲學基本問題和核心範疇敏銳而深刻的觀察眼光。

1900年，舍氏回到俄國。在彼得堡大學任東方語言系文學講

[1] 米納耶夫曾師從韋伯（Albrecht Friedrich Weber，1825—1901年）教授並獲益於另一俄國印度學學者瓦西里耶夫（1818—1900年）的指導。米納耶夫曾整理巴黎國家圖書館的巴利文寫本目錄；與人合作校訂《翻譯名義集》梵文部分；刊行並翻譯《妙吉祥真實名經》《菩提行經》；校訂刊行《論事》撰《巴利語辭典》等。

[2] 奧地利著名東方學學者。曾在孟買、蒲納教書（1863—1866年）。從印度歸國後在維也納大學執教。對於印度考古學、古錢幣學、碑銘解讀、古代語言學均有貢獻。

[3] 德國印度學學者、語言學者。曾先後執教於基爾、波恩各大學。1913—1914年任教於加爾各答大學。其研究涉及比較哲學、印歐語比較、印度哲學、佛學、耆那教理等。著作有：《印度天文學》《羅摩衍那》《大婆羅多》《耆那教典》《印度諸神史》《彌曼差派及勝論學說》等。

座講師。旋即成爲俄國科學院院士。

19世紀初，對於中亞古代文化的研究熱潮伴隨著各國在中亞的考古探險活動而興起。俄國考察隊在奧登堡領導下兩次赴中亞活動。隨大量古代佛教遺址被發現，佛教學者和印度學學者的興趣紛紛轉到了對梵文、藏文、吐火羅文等古代文書的研究上來，北傳佛教一時成爲了西方佛學研究的熱門題目。舍氏本人也將眼光轉到了這方面，一開始從印度文學的文獻研究入門的他，著手進行印度哲學的，主要是佛教哲學的研究^[1]。這一時期，他掌握了藏文。

舍氏的門下弟子也因他在前後兩期的學術興趣而分爲兩部分。主要從事佛教文化和印度哲學研究的有羅森堡博士、奧伯米勒博士，再就是前蘇聯科學院院士伏拉基米爾采夫。後者對於蒙古的語言和歷史文化尤有深刻研究。另外一批佼佼者，如從事語言和文學研究的文學博士埃倫舒第托，他是科普特語和多種古典語的權威，現任俄國東方學研究所彼得堡大學教授。舍氏最早的學生弗勒曼爲伊朗古代文獻學的權威，現任彼得堡大學教授。舍氏的關門弟子卡良諾夫，現任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彼得堡大學講師，從事梵文文獻研究。

舍爾巴茨基的佛教哲學開始於對法稱《正理滴論》的研究。舍氏研究所依據的是梵文本子和該論的藏譯本。他的研究結果便導致了《佛教邏輯》一本的問世。《佛教邏輯》深刻地把握了法稱這一晚期佛教學者的認識論邏輯學傑作。作者在書中運用比較哲學研究方法

[1] 舍氏關於印度文學和語言的研究和教學都是第一流的，他曾開過梵語講座；關於《雲使》的研究講座；關於迦梨陀莎的《莎恭達羅》的研究講座。他的教學內容還包括拜尼尼文法原本、《哲學教科書》(Tarkabhāṣā)、《往世書》等等。他曾寫有印度史、印度學史、印度文學史、歷史文法、印度宗教史的講義。

研究了所謂瑜伽經量部的認識論。他稱法稱為「印度的康德」^[1]。

舍氏的佛教學研究活動還包括參與奧登堡院士開創的整理出版梵藏文佛都經典的《佛教文庫》的工作。這是 20 世紀初重要的國際佛教研究工程，德國、法國、英國和俄國的許多著名學者都參與其事。1904 年起，他的著述逐漸見之于《佛教文庫》。1910 年，他被推選為俄國科學院東方學部通信院士。同年往印度考察。他在孟買、瓦臘臘西、加爾各答等地結識了許多印度學者，對印度獲得了深刻的感性認識。這期間他努力搜集梵文寫本，尤其是正理方面的著作。他在大吉嶺謁見了達賴喇嘛並試圖往西藏搜集藏文經典，後未果。

歸國後，他著手研究被稱為「第二佛陀」的世親的《阿毗達磨俱舍論》和稱友的注釋 (vyākhyā)。此論又稱「解脫知識的寶藏」，是小乘說一切有部的系統哲學著作。此事的誘因是因為斯坦因在中亞發現了《俱舍論》的回鶻文寫本，國際學術界轟動一時。法國的列維 (Sylvain Lévi)、英國的羅斯 (Denisson Ross)、比利時的浦山 (L. de la Vallée Poussin)、日本的荻原雲來均投入了嘗試性的研究，舍氏可說是俄國方面的學者代表。舍氏研究的結果，便是 1923 年發表的《佛教的中心概念及「法」的意義》(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harma)。我們的中文譯本易名為《小乘佛學》。

由《俱舍論》研究往後，舍氏繼續他的佛教哲學研究。舍氏的思路是可以猜測得到的，他認為佛教的出發點是否定靈魂自我的學說，但從一種宗教哲學理論體系來看，除了哲學所關心的實體

[1] 此書漢譯本已在 1998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譯者宋立道。